叙事权力视角下美国“印太”联盟网络化构建

于泽洋 高 飞

摘 要：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正在重塑其盟友伙伴合作体系，构建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印太”联盟网络。美国通过操控话语，建构特定叙事框架，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需求转化为共有知识，在“权力—知识”机制的作用下，美国在联盟体系内部形成叙事权力，提升联盟内部凝聚力与执行效能。传统联盟关系理论的解释侧重于物质利益和权力分配，而本文提出的话语操控、叙事权力、共有认同等因素的作用在这些理论框架中却较少受到关注。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网络化构建路径有如下三个具体步骤。首先，美国通过话语操控创造“安全化”知识，形成叙事权力；其次，通过沟通行动开启社会化进程，建立社会规范、界定社会规则；最后，社会化过程形成场域关系，盟友在场域内部的关系性互动中明确了共有认知，确立了共有认同，建立了共有文化，推动联盟组织向体系化、网络化发展。通过比较分析“四方安全对话”和“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上述理论机制得到验证，美国在盟友间构筑了社会层面纵向耦合与政府间层面横向耦合的网络化体系。

关键词：“印太”联盟体系 叙事权力 话语操控 美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25)01–0076–28

作者简介：于泽洋，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37；高飞，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博士，100037

一、问题的提出

在大国战略竞争的时代背景之下，美国正在全球范围内重塑其盟友伙伴的合作体系，这一变革既体现在地缘政治布局的调整，又体现在盟友关系理念的重塑上。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放弃了以支持全球化为核心的政策，转而推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

的战略，以战略竞争取代全球化成为对华政策的基调，并基于地缘政治竞争提出了“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以重塑美国国家利益与战略重点。[①]美国联盟政策主要基于现实主义大战略考量，追求地缘利益最大化，但在当前更趋复杂的国际格局背景下，美国也将价值观纳入盟友政策，试图在联盟内部凝聚以“民主、人权、法治”为核心的价值共识。如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在第二届“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领导人峰会上表示，“在一个不确定和动荡的世界里，美国将坚定不移地选择每一个民主伙伴，因为我们必须防范那些希望通过胁迫改变现状的国家”。[②]这一表述标志着美国试图在“印太”地区构建一种所谓“民主价值联盟体”。由此可见，拜登政府延续了对华强硬政策、重视“印太”地区，进一步优化了联盟关系管理，确立了“民主优先”的外交政策，建立了一系列机制并形成“网络化安全结构”（networking security architecture），[③]以“印太战略”为代表的美国联盟体系正逐渐向“网络化”结构转型过渡。

在这个网络结构中，除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美国还试图通过操控话语和建构特定的叙事框架，通过叙事权力影响盟友的认知和行为，在联盟组织内部凝聚“价值共同体”。美国在多个国际场合和声明中反复强调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例如，在“四方安全对话”和“三边安全伙伴关系”（Trilat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AUKUS）的联合声明中，美国对“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反复重申与强调。这些声明不仅明确了联盟的共同目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45.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Prime Minister Kishida Fumio of Jap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of India, and Prime Minister Anthony Albanese of Australia at the Second In-Person Quad Leaders’ Summit,” *The White House*, May 24, 2022.

③ 车韦德（Victor D. Cha）认为，传统意义上美国联盟的体系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遏制苏东集团所构筑的涵括欧亚、中东等地区的联盟体系，其中北约和东亚地区的“轴幅体系”（“hub-and-spokes” system）发挥了支柱作用。参见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3, 2010, pp.158–196。马特奥（Matteo Dian）和迈耶（Hugo Meijer）认为，现在美国的联盟体系概念已逐渐向“网络化安全结构”演化，其内涵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由双边、小多边、防务协定、经济协定、合作协定等盟友+伙伴所编制而成的网络化体系。参见Matteo Dian and Hugo Meijer, “Networking Hegemony: Alliance Dynamic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7, 2020, pp.131–149。

标，也强化了成员国对这些价值观的认同。[①]美国还通过高层会谈和公共外交等手段，广泛传播其构建的叙事框架。例如，美国政府和主要媒体频繁报道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行为，强调这些行为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从而塑造了一个共同的“对手”形象，不仅在国内获得支持，也在盟友国家中达成了共识。[②]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在构建同盟体系过程中，美国如何通过话语操控形成叙事权力？叙事权力又如何推动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网络化？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美国当前的外交策略，也能为后续联盟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既有研究评述

梳理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研究的文献，不难发现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分析路径。就目前而言，学界围绕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的形成以及联盟关系管理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

一是安全保障论。美国通过防务技术共享和军事装备升级等手段，显著提升了盟友的防务能力。例如，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美澳防务贸易合作条约》（The U.S.-Australia Defense Trade Cooperation Treaty），通过授权生产、数据共享和联合开发，促进了澳大利亚防务装备的迭代升级。[③]此外，美日印澳四国也积极通过四边机制加强安全合作。[④]从理论层面辨析，美国通过技术共享与防务合作机制建设为联盟体系提供安全保障，从而增强了盟友间认同。

二是经济互惠论。美国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建立“印太经济框

① Sheila A. Smith, “The Quad in the Indo-Pacific: What to Know,”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27, 2021; Derek Grossman, America’s Indo-Pacific Alliances Are Astonishingly Strong,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5, 2023.

② David Brewster, *India and China at Sea: Competition for Naval Dominance in the Indian Oce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10–113.

③ William T. Tow,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The Pacific Review*, Vol.32, Iss.2, 2019, pp.232–244.

④ 杨思灵、任吉蕾：《美日印澳（QUAD）：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载《南亚研究》，2022年第1期，第58—72页。

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重塑其在“印太”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推动经贸合作朝安全化方向发展。[①]美国还实施“蓝点计划”（Blue Dot Network，BDN），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等经济领域，以对冲中国的制度性安排。[②]这一理论认为，通过经济互惠，美国希冀在全球经济战略布局中减少盟友对华经济依赖性，这一点对增强联盟合作至关重要。

三是共享价值论。国际政治社会学认为观念、价值、规范形成了国际社会凝聚力，维系着盟友间的战略防务伙伴关系。[③]例如，2016年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指出，澳大利亚通过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合作，以期维持现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④]共享价值观还增强了联盟团体内部的认知和凝聚力，从而提升了战略威慑能力，AUKUS便是基于共享价值观念维系的典型例子。[⑤]通过举办“民主峰会”（The Summit for Democracy），美国将“民主价值观”与“自由开放的印太”（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秩序相联系，引导成员国配合其地区战略。[⑥]尽管各成员国的利益认知和对“印太”秩序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认同“自由与开放”的基本原则。

四是机制合作论。国际机制合作能够增进国家间的认同，地区主义认为，地理位置相近且政治经济相互依存的国家会基于自身利益和相互关系，

---

①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022, pp.11–12; Mohammadbagher Forough, “America’s Pivot to Asia 2.0: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The Diplomat*, May 26, 2022, pp.1–9.

② 张家栋、王祥宇：《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实质、由来和发展趋势》，载《国际观察》，2022年第4期，第73–74页。

③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1992, pp.391–425; He Kai, “Three Faces of the Indo-Pacific: Understanding the ‘Indo-pacific’ from an IR Theory Perspective,” *East Asia*, Vol.35, Iss.2, 2018, pp.149–161.

④ “2016 Defence White Paper,” *Australia Government Defence Department*, February 24, 2016, p.46.

⑤ Yui Nishimura and Atsushi Tago, “Are Shared Values Valuable? liberal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mong AUKUS and its Future Membe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Canada’s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alysis*, Vol.78, Iss.3, 2023, pp.394–416.

⑥ 曹鹏鹏：《“印太”视域下小多边安全合作的联盟管理——以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为例》，载《南亚研究季刊》，2022年第3期，第8–9页。

应对共同挑战。[①]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多边制度，这些国家能够有效处理相互关系，增强区域内的合作和协调。[②]例如，“五眼联盟”（The Five Eyes，FVEY）通过深度情报共享机制维持非对称联盟，而《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The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United States Security Treaty，ANZUS Treaty）则通过“责任共担”机制合作增强内部协调。[③]小多边安全合作中的议题管理具有合作支撑机制，进一步提升了联盟内部的凝聚力和一致性。[④]在Quad中，美日印澳通过构筑“印太”遏制网限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逐步形成了一个有限开放的多元立体合作网络。[⑤]该网络以美国为中心，美国的主导性十分显著。

五是相互依赖论。该理论认为，联盟进程是一种社会化进程。定期会议、军事演习和展示团结等社会互动使同盟国家逐渐认同彼此的利益，并形成内化同盟规范。[⑥]建立同盟的高昂代价形成了社会性的相互依赖，维系了多数联盟团体，联盟关系维系基于可靠性的信念，而非忠诚，通过对“可靠性”的评价得到实现。[⑦]从防务安全实践看，美国与盟国存在“相互利用”关系，美国依靠联盟体系提供边界安全区与防务前线，而盟国则通过与美国合

① John Gerard Ruggie,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terna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1.

② John Gerard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Iss.3, 1992, pp.561–598.

③ Andrew O’Neil, “Australia and the ‘Five Eyes’ Intelligence Network: The Perils of an Asymmetric Alli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1, Iss.5, 2017, pp.529–543; Joanne Wallis and Anna Powles, “Burden-sharing: the U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lliance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7, Iss.4, 2021, pp.1045–1065.

④ 曹鹏鹏：《“印太”视域下小多边安全合作的联盟管理—以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为例》，第7页。

⑤ 杨思灵、任吉蕾：《美日印澳（QUAD）：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第59页；刘思伟、高旭：《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议程变迁、网络构建与演化逻辑》，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1年第5期，第119页。

⑥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46–49.

⑦ Iain D. Henry, “What Allies Want: Reconsidering Loyalty, Reliability, and Alliance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4, Iss.4, 2020, pp.45–83.

作确保自身的相对优势。[①]这种社会化的进程使盟友间形成责任感、道德上的约束，构建行为规范、认同共享利益。

通过已有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理论层面上关于美国“印太”联盟体系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安全保障论的核心内容是塑造盟友间关于外部威胁的共同认识来促进与维持相互间的合作；经济互惠论强调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逐步与中国产业链“脱钩”，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增进盟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共享价值则是基于“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作为相互合作的基础共识；机制合作是从地理区位、地缘政治、国家实力等角度来增进盟友间的认同。这些对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的解释，从各自视角阐释了美国构建联盟组织的必要性，并从价值共识的角度解读了美国维护与其他国家联盟关系的可能性。

尽管美国与其盟友间形成了高度认同，但差异性依然存在，甚至可能演变为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滞缓了“印太联盟网络化”的进程，限制了合作空间。同时，现有的理论仍有很多未尽解释，主要表现在：第一，安全保障论和经济互惠论虽有助于分析国家间的利益驱动，但未能解释“印太”国家在价值观和战略取向上的分歧。由于每个盟友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因此在联盟体系中实现政策一致性可能会面临诸多制约，这可能会导致在执行决策时出现分歧，影响到联盟的整体效率。第二，共享价值论、机制合作论虽强调了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的作用，但未能消除盟友间的历史裂痕和现实利益冲突。如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由于对华经济依赖，在联盟建设上步履维艰；日韩两国又因历史纠葛和现实利益矛盾而合作受阻。第三，相互依赖论虽重视联盟的社会化，但缺乏对社会文化认同建构过程的分析。如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趋同是社会文化认同建构的结果，而非道德、责任上的约束；“印太”联盟网络化的构建路径并非仅依靠防务实践，而是一套更为复杂的逻辑体系。

① Rachel Ellehuus and Colin Wall, “Leveraging Allies and Partner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28, 2021, pp.1–16.

这表明，需要一个更加综合和动态的理论视角，来解释和应对当前“印太”联盟关系中的复杂困境。本文借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权力—知识”复合体、社会场域建构过程的论述，构建叙事权力（narrative power）的分析框架，期望以此深化对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网络化的理解，解构美国对中国围堵打压的路径链条，并就此提出针对性建议。

三、美国推动“印太”联盟网络化的叙事权力过程

叙事概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日益流行。国际关系学者通过探究语言与行为的因果关系，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合理性解释，但围绕叙事如何在国家间交往中发挥作用和影响仍需进行概念化、体系化研究。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叙事通过连接事件或现象为行为体提供认知观，对事件或现象本身赋予特定价值内涵，达到动员集体行动、构建权力关系的效果，叙事权力为理解美国“印太”联盟网络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美国通过操控话语，建构“安全化”知识，通过叙事框架向行为体传递，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需求转化为共有知识。在“权力—知识”机制的作用下，美国不仅在社会内部形成权力关系，还通过沟通行动开启社会化进程，构建了一个以其价值观和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秩序。这既巩固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又进一步提升了联盟内部凝聚力与执行效能。具体而言，叙事权力视角下，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的构建路径需要以下步骤。首先，通过话语操控形成叙事权力；其次，通过叙事权力主导社会化进程，建立规范、界定规则；最后，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社会场域，提升执行效能，推动联盟体系网络化。

（一）叙事权力的生成路径

叙事权力的本质是一种知识性权力。权力与知识不是分离的，而是相统一的，权力关系的形成并非是外部的强加，而是施动者通过话语操控

（discourse manipulation）[①]创造知识，进而在行为体自我学习的过程中塑造主体性（subjectivity），延展和定义知识内涵，并借此维持权力关系。[②]任何知识的背后都蕴藏着“真理—谬论”“善—恶”的对立关系，当真理与善得到允许和推崇，谬论与恶遭到反对和排斥时，知识便界定了一种权力关系。同时，知识的生产离不开叙事框架。施动者通过持续的话语实践控制知识的生产，获得在特定领域内建构主导性叙事的能力，并将这一叙事内化为制度性规范和思维模式，塑造行为体特定认知结构，[③]从而在社会内部建立行为体对身份、事件、价值的共识。

首先，话语操控创造了知识。知识的被创造有其特定的路径。当前学界遵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知识的创造是在观察规律性现象间的存在联系的基础上，通过过程演绎与客观实证，找寻一个超越时间维度、恒定不变的因果逻辑机制。[④]但在观察近代社会向现代性社会的演化过程中，不难发现知识本身的创造离不开话语的参与，语言可以框定其叙事内容和意义体系，通过特定语言修辞、符号隐喻、文本构建等路径向主体对象传递文本概念、意义链条，从而实现知识的创造。施动者在建构的特定叙事框架下，通过持续不断的话语实践，逐渐形成社会内部的主导知识体系。[⑤]例如，施动者通过话语操控创造“威胁知识”，将非安全问题建构为安

① 话语操控（discourse manipulation）指的是通过特定的修辞和话语策略，有意识地对现实进行再现、解释和建构，从而影响受众的认知和判断，话语操控的实现路径包括：设置议题议程、渲染特定话语框架、引导受众认知等。参见Kuralay Kenzhekanova, et al., “Manipul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of Mass Media,”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6, No.4, 2015, pp.325–332; 艾喜荣：《话语操控与安全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3期，第64–71页。

②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p.27–28;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0, pp.109–133.

③ Alister Miskimmon, et al., *Strategic Narratives: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38–42.

④ 郑莉：《理解鲍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9页。

⑤ 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and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Graham Burchell, et al.,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With Two Lectures by and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59–62.

全问题，开启“安全化”[①]进程。这种话语操控使施动者可以获得额外的关注和紧急处理的合法性，话语操控也是一种沟通行为，旨在通过调整信息的呈现方式来塑造受动者对于知识的理解和反应，在施动者框定的叙事框架内逐步理解、接纳和再生产。

其次，知识塑造了主体性。主体性是指个体作为主体在认识、情感、价值观、意图等方面的独立性与主动性，行为体在自我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与施动者相契合的价值判断。具体而言，施动者通过叙事框架传递特定知识，行为体在接纳、理解、内化知识的过程中改变社会认知结构，对既有的现象加以情感价值判断，塑造了主体性。例如，美国通过安全化叙事框架，不仅构建了“全球反恐”（the war on terror）的知识体系，还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和媒介宣传延展知识内涵，使知识体系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价值和行动准则。[②]这种传播过程使行为体在价值观和社会认知上与施动者形成了叙事共鸣，赋予了一套共有知识体系。施动者在知识的传递与再生产过程中不仅影响了行为体对于信息本身的判断，更进一步塑造了行为体的本体世界观、价值体系和自我身份构成，[③]行为体在不断自我理解与认识的基础上，形成趋同于施动者的价值观念。

最后，知识定义了权力关系。叙事权力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它不仅源于话语操控，也通过实践中的应用和验证，在获取叙事权力后，施动者的话语操控能力也随之增强，主导性的权力关系地位有利于施动者自身对于知识的定义，并压制异议声音，从而形成一种正向循环。[④]施动者围绕特定的政策、理念或者价值观，定义知识建构叙事框架，不断塑造公众和国际

① 安全化理论源自哥本哈根学派，主张安全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状态，更是一个通过话语建构的过程。参见Barry Buzan, et al.,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p.23–42。

② Ronald R. Krebs, *Narrative and the Making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2–41.

③ Margaret R. Somers, “The Narrative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A Relational and Network Approach,” *Theory and Society*, Vol.23, No.5, 1994, pp.627–632.

④ 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and the Study of Discourse,” p.70.

社会对某些议题的理解和态度。当这些知识被目标受众接受并内化时，叙事权力开始形成，进一步指导行为体的内部政策制定和外部关系行为，如施动者通过支持特定的国际议程、签署协议或参与国际合作等。当叙事内容通过这些政策和行为得到实际应用和验证时，其合法性和影响力也将得到增强，[①]这种从实践中得到的反馈效应，又反向强化了原始叙事的权威性和说服力，使相同或类似的叙事传递在未来更加有效。

因而如图1所示，施动者通过话语操控创造知识，通过叙事框架向行为体传递，行为体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塑造主体性，从而定义权力关系，反向支撑施动者的话语操控能力，形成叙事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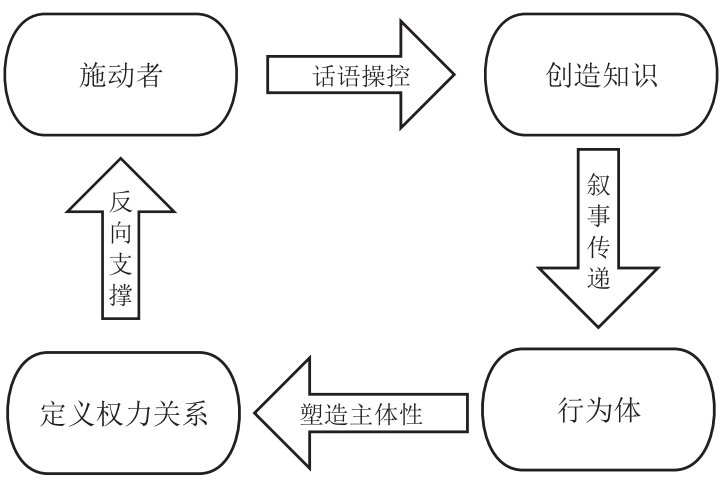

图1　叙事权力的生成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叙事权力主导下的社会化

叙事权力不仅涉及到知识的传递和内化，也涉及到规范和规则的形成。知识的传递和内化有赖于理性的沟通与行动，并在这过程中开启社会化进程。社会化是行为体增加社会认同，扩大社会影响的重要环节。[②]行为体在沟

① Jean K. Chalaby, “Beyond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Discourse as a Sociological Concep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47, No.4, 1996, pp.684–698.

② 郭树勇：《国际政治社会学简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

通行动的过程中逐步接受并认同这些知识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形成了对施动者领导角色的广泛认同，为社会内部塑造了规范、界定了规则。

一方面，沟通行动塑造了社会规范。诚然，叙事权力的干预在现代知识建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要关注到社会内部行为体本身的主体性因素，辩论真伪、保留自我等行为方式本就是人类在认识自我与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主观能动性。主体性观念的塑造不仅仅依靠施动者本身创造的知识形成，还需要在叙事框架建构的公共空间内由不同行为体在沟通行动的过程中产生，也只有依靠所有行为体的参与才能实现知识的合法性与认知的理性。[①] 同时，施动者在目的性传导过程中会结合自身的政治文化、政治理念创造“话语伦理”（discourse ethics），以此建立一种合理沟通的规范性基础，形成一套由共同语言和概念体系构成的政治符号系统。[②]这套符号系统不仅涵盖了对特定知识的概念化，也包括了施动者本身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这使得行为体能够基于相同的前提进行沟通和行动。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能确保知识的理性，也只有在理性沟通的过程中才能塑造行为体主体观念的规范性，从社会化的沟通实践中产生规范。

另一方面，规范基础界定了社会规则。叙事权力在规则的界定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规范性基础作为主体间互动的重要保障，并非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产物，而是通过公共空间中的沟通行动逐步形成的集体共识。[③]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不仅展现其主体性，还在叙事框架内共享和认同施动者的价值规范，确保社会规则的合法性与普适性。施动者通过塑造“话语伦理”建立共同的政治符号与概念体系，使行为体能够基于一致的符号系统开展沟通与合作，构建起稳定而具有适应性的规范基础，不仅为行为体提供了行为指南与

① Jonathan Joseph, *Social Theory: A Read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99–200.

② Jürgen Habermas,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pp.23–27.

③ Linus Hagström and Karl Gustafsson, “Narrative Power: How Storytelling Shapes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2, No.4, 2019, pp.390–391.

约束，还为其批判性反思和规则重塑提供了空间。在社会化进程中，行为体既接受既定规则，又通过参与沟通实践推动规则的动态调整，使规则与历史情境和文化背景相契合，从而保持其理性和开放性。通过这一动态机制，规范性基础实现了稳定与发展的平衡，既为社会空间界定规则，又体现了社会整体的文化价值与认知理性。唯有通过持续的理性沟通与协商，社会规则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中不断演进，以维持其合法性、适应性与规范性。

如图2所示，施动者在沟通行动的过程中形成政治符号系统，开启社会化进程，塑造社会规范，所形成的规范性基础又促进了社会规则的形成。社会规范既为行为体提供行为边界和行动依据，又融入规则体系，使规则充分反映施动者的价值观念。同时，行为体通过沟通实践，对既定规则进行反思与调整，使规则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在稳定性与开放性之间取得平衡。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不仅逐步接受规则，还认同施动者的领导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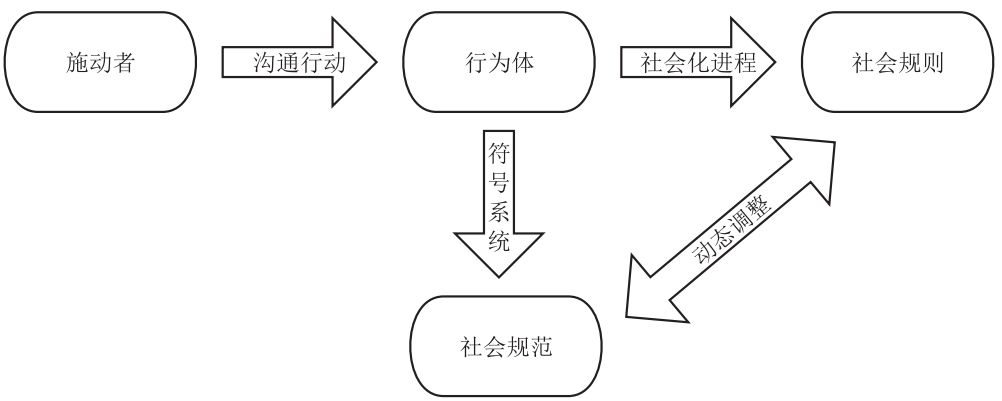

图2　叙事权力主导下的社会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社会场域的形成

叙事权力在主导社会化进程中创造了社会场域（social field）。[①]符号互

① 社会场域由布尔迪厄在《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提出。社会场域指的是一个由多种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所驱动的竞争空间，同时每个场域内部都有其特定的规则和逻辑。参见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94–97。

动巩固了场域关系的稳定性，场域内部社会力量与制度的动态特征，进一步强化了场域内部行为体的行为模式，不断重塑和再生产权力关系。同时，施动者与行为体确立了深层次的共有记忆，这种深层次的情感记忆使主体间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战略利益契合，而是通过非制度性手段来指导行为体的社会实践，推动场域行为体在对外决策时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和协调性，增强了合作效能。

一方面，符号互动巩固了社会场域的稳定性。符号互动指的是通过语言、符号和文化实践，行为主体之间进行的意义交换和认同建构。社会场域中的规范和规则不仅反映了现有的权力关系，还通过符号互动不断影响和塑造这些关系。[①]施动者通过叙事权力，推动了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和规范的生成，如改革现行组织体系、建立区域制度框架及达成多边合作协定等，这些制度性安排不仅符合施动者的利益，也使其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得以制度化，进一步强化其在社会场域中的主导地位。叙事权力的应用还带来了对知识和规范的生产与再生产，通过教育、媒介和外交等渠道，逐步将施动者的叙事框架社会化为共识。[②]这种文化层面的认同和共鸣，巩固了施动者在社会场域中的领导地位，场域内部的规范性引导着行为体在缺乏明确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在未知明确后果的情况下做出与共同价值和标准相符的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性依赖不断加深，场域行为体在这种行为模式的指导下，不断重塑和再生产权力关系。

另一方面，共有身份是场域内部主体间互动的结果。在叙事权力主导的社会结构中，施动者作为具备资本优势的行为主体，能够在场域内设定议程，主导话语体系，施动者通过掌握经济资源、军事力量和文化影响力，构建了契合自身利益的社会场域，在场域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施动者通过

① 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8, No.2, 1983, pp.147–160.

②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Iss.4, 2005, pp.801–826.

经济实力和军事存在，对国际体系结构施加影响，从而在国际规范层面产生施动性变化，使叙事框架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规范。[①]这种社会结构不仅赋予施动者塑造规范和制定规则的能力，还提供非制度化手段来约束场域内部行为体行为，共有记忆则是场域内部主体间互动的结果。在主体间关系互动的过程中，施动者与行为体形成了历史性导向（合作基础、文化纽带）的叙事（past-oriented narrative），共同特征（道德标准、价值相似性）的现代性导向的叙事（present-oriented narrative），属于集体愿景的未来性导向的叙事（future-oriented narrative）。[②]具体而言，施动者通过纽带叙事来追忆各成员国的行为性（互动的范围和深度）、情境性（属于共同的历史与文化）和规范性（相互承诺、共同的价值观），塑造了场域内部的集体记忆与主体身份，强化了共有身份。

（四）研究推论

如前所述，叙事权力的生成路径、社会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与社会场域形成之间的逻辑联系明显，具体的逻辑延展及研究推论如下。

首先，叙事权力为社会化进程提供了基础。施动者通过话语操控创造和传播特定知识，构建符合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叙事框架。这一框架不仅塑造了行为主体的认知和价值观，还通过“权力—知识”机制确立了施动者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不仅是信息传递，更是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施动者通过不断强化其话语权，确保叙事框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在社会内部形成稳固的权力关系。这一“权力—知识”结构为社会化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和认知基础，使施动者能够在叙事框架内与行为体沟通行动。

其次，叙事权力主导了社会化过程，推动了社会规范与规则的形成。施动者通过沟通行动传递政治文化和理念，建立共有的政治符号系统，这一系统规范了社会成员的行为，并通过理性沟通和协商实现社会规则的动态调

①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Iss.4, 1998, pp.887–917.

② Tracy Adams, et al., “How Do States Reminisce? Building Relations Through-Bonding Narrativ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59, Iss.1, 2024, pp.47–65.

整。社会成员在接受和认同这些规范的同时，也积极参与规则的演化，使行为体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与规则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增强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适应性。叙事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规则和规范的制定者，更是其动态调整的引导者，稳固了社会规范的合法性和普适性，确保了社会规则的持续有效性和开放性，提升了社会结构的凝聚力。

最后，社会场域内的主体间互动实现了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施动者通过符号互动，不断巩固在场域中的主导地位，将其叙事框架社会化为广泛共识，进而强化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力量与制度的动态演变使权力关系不断重塑和再生产，确保施动者具备在场域内部建构叙事的能力。共有认同则是结果，施动者通过纽带叙事构建集体记忆与共有身份，增强了行为主体间的协调性与一致性，共有身份使行为主体在深层次上认同并支持施动者的领导地位，确保了社会场域内权力关系的稳定与持久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场域关系的执行效能。

基于上述理论机制过程，本文提出如下研究推论：

推论一：话语操控形成叙事权力。美国通过话语操控建立“安全化”知识，通过特定叙事框架在联盟体系内部传递知识塑造国家主体性，形成叙事权力。

推论二：叙事权力推动社会化进程。美国通过沟通行动传递知识，开启联盟体系社会化进程，在沟通行动的过程中塑造了社会规范，在社会化的实践中又界定了行为规则。

推论三：社会场域提升执行效能。社会化进程构建场域关系，场域内部的主体间关系互动使联盟参与国进一步增进内聚力和执行效能，进而向“网络化体系”转型。

后文通过解构美国在构建“印太”联盟体系网络化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对叙事权力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验证上述提出的三个推论。

四、基于Quad和AUKUS的案例验证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进一步东移，Quad和AUKUS在美国“印太”联盟体系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其“印太”联盟体系网络化构想也是这两个联盟组织的进一步延展。尽管合作模式不一样，但通过检验过程不难发现Quad和AUKUS内嵌互涵的特征。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美国在“印太”联盟体系网络化过程中的叙事策略，解构其内嵌互补的复合关系，分析美国如何进行操控话语和建构特定叙事框架影响盟友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为本文的理论框架提供实证检验。

（一）背景：成员国的参与动因

美国在主导Quad和AUKUS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其全球战略的核心理念，即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遏制潜在竞争对手，维护自身的全球霸权。其中Quad主要关注政治文化塑造，AUKUS则侧重于巩固地区军事存在和维持离岸战略投放能力。在Quad框架内，美国希望通过传播所谓“中国威胁论”“航行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等政治理念，建构一个由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组成的“民主价值共同体”（democratic value-based community），塑造美式政治文化。美国通过这一策略锚定竞争对手，在政治层面上孤立中国，削弱其地区影响力，以此稳固其在“印太”地区的“合法性”地位。[①]在AUKUS框架中，美国的动机是通过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紧密合作，提升盟友的军事能力，特别是在海上作战和高科技领域。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不仅能增强其海上威慑力，还能通过联盟体系的优势收缩战略资源，化解当前战略透支的困境。

当前，日本在战略上也十分重视Quad这一机制。事实上，Quad概念最初由日本提出，通过推动Quad成立，日本试图借助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力

① 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How America Can Shore Up Asian Order A Strategy for Restoring Balance and Legitimac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2, 2021, pp.3–4.

量，构建一个多边安全框架，从东海和南海两个方向遏制中国发展。通过强调共同的价值观和安全利益，日本不仅希望提升自身在该地区的安全地位，还意图借此增加国际话语权，并在推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增强国内外对日本军事角色的接受度，从而为其未来的武装化、正常化铺平道路。[①]其背后的核心动因在于期望借助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机会，逐步实现自身的军事正常化，摆脱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对其军事发展的限制，重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印度则期望通过参与Quad实现自身的“大国战略”。印度一直致力于推动“大国外交”战略，借助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合作，提升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和话语权。尤其是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着重关注边境纠纷、拱火地区热点，试图通过炒作“中国威胁论”牟利。印度利用与中国在边境争端中的强硬态度来展现战略决心，获得美西方的更大关注度，在“印太战略”中提升战略优先度，以此来获取更多军事技术和战略资源，强化军事能力和区域存在感。[②]这一策略不仅使印度在“印太”地区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还为经济发展、军事建设、提升国家声望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有利于实现其“大国梦”。

澳大利亚则希望通过与美国“战略绑定”，实现其“中等强国”战略目标。就客观事实而言，澳大利亚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且互补性强，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无法离开中国，但受限于其自身构筑的意识形态壁垒，澳大利亚不仅未将中国认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反而在认知层面将中国渲染成“威胁”，从战略层面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在AUKUS框架下，澳大利亚获得了建造核动力潜艇的技术支持，大幅提升其海上作战

① Sheila A. Smith, *Japan Rearmed: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P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34–36.

② Harsh V. Pant and Vivek Mishra, “China’s 2020 Line of Actual Control (LAC) Incursion: A Function of India-US ties?” *India Review*, Vol.23, Iss.5, 2024, pp.488–490.

能力，还获取了人工智能与芯片技术，极大弥补了在该领域的短板。[①]通过与美国的战略对齐，澳大利亚不仅推进了自身防务建设与技术发展，还增强了地区影响力。从根本上说，澳大利亚希望通过参与Quad和AUKUS，强化自身的“西方国家”属性，支持美国维护西方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避免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体系中被“边缘化”。

英国在脱欧后积极寻求重新定义其国际角色和战略定位。参与AUKUS不仅符合“全球英国”战略（Global Britain），还能通过与美、澳两国的军事合作，进一步稳固“英美特殊关系”（U.S. & U.K. Special Relationship），巩固英联邦的内在凝聚力，增强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和全球政治影响力。[②]同时，英国也希望在军事技术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尤其是网络安全、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等）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展开深入合作。AUKUS有助于提升英国的科技竞争力和战略自主性，确保其在未来国际安全格局中的重要地位。[③]尽管Quad和AUKUS的成员国都有各自不同动机和初衷，但其共性都是基于“安全化”知识，不同点主要在于操作方式与合作模式，这两个联盟不仅增强了成员国的安全合作，也为美国推动“印太”联盟体系网络化发展提供了基点。

（二）话语操控建立“安全化”知识，形成叙事权力

美国通过话语操控建立“安全化”知识，成员国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塑造了认知结构，改变了客观地缘安全环境，形成叙事权力。

首先，美国通过操控话语建立“安全化”知识。在美国的话语操控下，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试图通过军事扩张和经济胁迫来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即“公众的对立面”。美国也在此基础上建立“安全化”知识。例如，美国2017版《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指出，“印太竞争归根结底是两种秩序形态的竞争，即自由和压迫，中国试图通过

① Derek McDougall, “AUKUS: a Commonwealth Perspective,”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12, Iss.6, 2023, pp.571–573.

② Ibid., p.573.

③ Ibid., p.574.

削弱经济自由和公平、提升军事现代化、控制信息和数据的自由流动、争夺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治理权。”[①]在该叙事框架下，美国与其盟友通过一系列联合声明和会议，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和改变现状”的企图，强调维护“基于规则国际秩序”的重要性，这种话语操控也在盟友间传递了威胁认知，创造了知识。例如，2021年Quad峰会联合声明指出，各成员国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反对任何胁迫行为。[②]通过高层会议和联合声明，盟友能够统一口径，形成一致的对外信息，例如在2023年5月的广岛峰会（2023 Quad Leaders' Summit, Hiroshima Summit）中，Quad进一步重申对“自由、开放、包容、有韧性”的“印度—太平洋”承诺，认为应该与“印度—太平洋”伙伴密切合作，共同度过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机遇的时期。[③]Quad和AUKUS还通过军事演习和联合行动为知识的传递提供了政治视觉支持，媒体报道和官方新闻发布会进一步放大了这些行动的影响，向盟友国内社会展示了集体行动的能力和政治决心。通过政府间、社会间双向联动的方式将知识传递给Quad和AUKUS受众，不断扩大影响范围。

其次，美国建构特定叙事框架传递“安全化”知识。Quad概念最早于2007年提出，但在磋商过程中由于四国缺乏共同战略目标和内部意见分歧导致后续合作步履维艰。Quad对话在2017年得以重启，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支柱，并在随后几年中逐步制度化，[④]实质而言是美国的各种行为塑造了成员国应该学习到知识的结果。在学习、理解知识的过程中，美国的盟友国家重塑了本体世界观、价值体系和自我身份构成，产生与美国相契合的价值判断。例如，钓鱼岛争端和南海问题便是认知结构变化所造就的，在2024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2017, pp.45–47.

② “Joint Statement from Quad Leaders,”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4, 2021; Samir Saran, et al., *Two Decades of the Quad: Diplomacy &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 2024, p.21.

③ “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May 20, 2023; Samir Saran, et al., *Two Decades of the Quad: Diplomacy &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p.9.

④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2017, p.46;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9–10, p.16.

年6月的中菲南海争端中，菲律宾非法侵闯仁爱礁海域，秘密运输武器装备，明显加剧海上紧张局势，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①]就事实而言，联合国本就划定了各国领土、海域主权，但菲律宾仍然选择漠视国际法，非法闯入中国领土、海域，中国仅仅是在维护自身主权、安全，而非挑起事端。对于韩日而言，认知结构的变化来自于美国的知识性传递。朝鲜拥核与洲际导弹实验是客观事实，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在美国的叙事框架内，却不断影射中国作为其背后的主要推手，无视中国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安理会为推动半岛无核化所作出的贡献。这一后果导致了半岛地区局势紧张化，为日本加速再武装化进程创造了合理性依据，进一步破坏地区安全环境，领土争端和地区紧张局势不断激化致使Quad和AUKUS等联盟体系的战略效用得以放大。

最后，“安全化”知识定义权力关系，形成叙事权力。安全环境的变化建立了美国的叙事权力，地区与域外盟国的认知结构得以转变，自发迎合美国战略目标、保持战略对齐，AUKUS的创建则是权力关系的具体实践。AUKUS涵盖了网络能力、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多个前沿科技领域的合作，使其能够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维持相对优势。[②]因此AUKUS更多是基于主体性变化所创造的安全实践，这种安全实践巩固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AUKUS成员国间的合作还涉及核潜艇建设核技术转让，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NPT）签署国，美国既有义务也有责任去维护核技术安全。长期以来美国以核设施建设为由，策划实施了多批单边、小多边制裁，但在澳大利亚核技术转移问题上，美国为满足其战略需求，采取了双重标准，以保障其盟友的军事利益。对于日本和印度来说，参与Quad也是基于各自的安全需求，通过参与Quad，日本希望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同时提升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地位。[③]时任日本首相岸田

① 钟声：《菲方对南海局势紧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载《人民日报》，2024年6月27日，第17版。

② Derek McDougall, “AUKUS: A Commonwealth Perspective,” pp.577–579.

③ Sheila A. Smith, *Japan Rearmed: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Power*, pp.34–36.

文雄（Kishida Fumio）在2023年3月发表题为《印太未来》（The Future of the Indo-Pacific）的演讲，重申了地区参与的必要性，强调了“责任分担”的重要性。[①]印度则希望通过Quad加强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以此来对冲中国地区话语权的提升，通过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印度不仅能获得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还能提升其海上力量和区域存在。[②]尽管Quad和AUKUS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联盟组织，展现出各自不同的合作方式。但在“权力—知识”机制的作用下，两个联盟组织又呈互嵌内套的特征，在盟友间构筑了一个由社会性力量纵向耦合，政府性力量横向耦合的复合阵营。[③]不难发现，这种物质、制度层面的机制复合体是叙事权力主导下的产物，为盟友间的社会化进程奠定了基础。这种动态循环机制不仅帮助美国在“亚太—印太”地区维持影响力，还使得盟友在应对所谓“安全威胁”时更加依赖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支持。

（三）沟通行动开启社会化进程，建立社会规范与规则

美国在与盟国沟通行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套由共同语言和概念体系构成的政治符号系统，塑造社会规范，构建社会结构。同时盟友间又在具体的社会化实践中形成了社会规则，引导盟国的对外关系行为。由于客观历史环境、地缘环境是不断动态变化的，规则与规范又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盟国既接受既定规则，又通过参与实践调整规则，促使盟国在“印太”地缘空间的深度融入与协同发展。

首先，美国通过与盟友间的持续沟通行动，开启社会化进程。这些沟通行动包括高层外交会议、媒体传播、政治声明等多种形式进行交流、渲染，旨在传播和巩固美国自身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理念。例如，美国定期发布关于

① Kishida Fumio, The Future of the Indo-Pacific - Japan’s New Pla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SB*, March 20, 2023, pp.2–4, pp.11–12.

② Harsh V. Pant and Vivek Mishra, “China’s 2020 Line of Actual Control (LAC) Incursion: A Function of India-US Ties?” p.487.

③ 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39–43页。

“民主声明”“人权维护”等宣传美式价值理念的系列讲话、报告，还通过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来与盟友交流，将自身的政治理念嵌入社会规范。[①]在沟通过程中，美国利用“自由开放的印太”话语，强调“四方合作”在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中的重要性，[②]从政治文化层面对Quad和AUKUS进行规范塑造，在行动过程中，美国将Quad和AUKUS设定为一个“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政治符号，通过核潜艇技术的引入、“印太”军事前沿存在等实践活动将“印太”地区打造成为一个沟通行动的公共空间，使成员国在合作过程中能够遵循相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通过主体间的沟通行动，美国不仅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塑造了成员国行为规范，还将自身的政治文化、政治理念内嵌其中，建立一套共有语言和概念体系，形成政治符号系统。

其次，社会化实践过程中建立社会规则。在建立了共有政治符号系统和社会规范后，美国通过具体的社会化实践，将规范转化为行为体的具体行动指南，形成社会规则。这些规则并非通过明确的法律法规制定，而是通过主体间互动和实践形成的规范在国家内部延展，[③]使国家在对外关系实践中遵循一定政策方针。尽管Quad和AUKUS这两个联盟组织所面临的行为模式存在一定差异，但在社会化的实践中美国与盟友对既定规则进行反思与调整，使规则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不断发展。例如，Quad成员国在讨论区域安全问题时，常以“共同防御”“信息共享”“经济互联互通”为核心议题，[④]这些议

① Antony J. Blinken, “The United States Promotes Accountability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Abuse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10, 2021; Uzra Zeya, “Inaugural Global Democracy Champions Summit Remark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1, 2022; “FACT SHEET: Delivering on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Commitment to Democratic Renewal at the Third Summit for Democracy,”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 2024; “White House and Department of State Convene Key Stakeholders to Support Internet Freedom Technologies to Counter Digital Repressi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6, 2024.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2017, p.46;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p.37–38.

③ Andrew P. Cortell and James W. Davis Jr, “Understanding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orms: A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 Iss.1, 2000, pp.65–87.

④ 曹鹏鹏：《“印太”视域下小多边安全合作的联盟管理——以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为例》，第9–11页。

题不仅规范了各国的政策取向，也为具体合作行动提供了主导思想。AUKUS在社会规则的形成过程中同样也遵循了规范性引导，澳、英、美三国在实践过程中强调“集体防御”“技术共享”和“透明合作”等组织规范，通过联合研发项目和军事训练计划平台，促进了三国间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①]这些理念规范了三国在具体合作中的行为方式，并通过制度化安排确保了合作的持续性和一致性。通过持续性的社会化实践，Quad和AUKUS内部形成了稳定的合作机制和操作规范，这些规范通过制度化安排得以长期维持，在战略目标和合作模式上形成了高度一致的认同，确保了联盟组织协调运作。

最后，社会规则与社会规范的动态调整。美国不仅在初始阶段通过沟通行动建立社会结构和规范，还通过动态调整机制，确保这些规则与历史情境和文化背景相契合。盟国在接受既定规则的同时，通过参与沟通实践，推动规则的动态调整，使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时代背景。例如，面对印度洋和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Quad通过调整合作重点，增加了对海上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关注，体现了其规则的开放性和适应性，[②]这种动态调整不仅增强了Quad在环境变化过程中的应对能力，也提升了其社会规范的合法性和普适性。同时，Quad和AUKUS在面对“印太”地区科技环境的变化时，通过调整议题增加了在这些领域的技术交流和合作项目，以确保“印太”地区的供应链韧性，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③]在这一动态调整的过程中，盟友不仅逐步接受规则，还认同美国的领导角色，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四）场域互动内化行为规范，推动联盟体系网络化发展

美国“印太”联盟体系在社会化进程中创造了社会场域，提升了联盟

① Lai-Ha Chan and Maria R. Rublee, “The Promise of AUKUS: Implications of its Minilateral Institutional Form,”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8, Iss.6, 2024, pp.852–860.

② Michael R. Pompeo, “Remarks on ‘America’s Indo-Pacific Economic Vision’ at Indo-Pacific Business Foru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30, 2018.

③ Jonathan Corrado, “Strengthening the Indo-Pacific Chip Supply Chain Opportunities and Obstacles for a Tech Alliance,” in Hyun Ji Rim and James E. Platte, eds., *Indo-Pacific Strategies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The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102–104.

执行效能。文化交流、军事合作等多层次的符号互动巩固了社会场域的稳定性，在场域内形成制度性依赖，美国还通过行为性、情境性和规范性塑造场域内部的集体记忆与主体身份，盟国在该行为模式指导下将美国的叙事框架内化为行为规范，明确了共有认知，确立了共有认同，建立了共有文化，从而推动联盟体系网络化。

一方面，符号互动巩固了社会场域的稳定性。通过多层次的符号互动，Quad和AUKUS成员国在社会层面和军事层面上紧密合作，这些符号传递的模式包括但不限于文化交流、军事演习，这种多样化形式增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在教育合作方面，Quad和AUKUS成员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定期开展学术交流项目，邀请成员国学者和学生定期交流访问。例如，美国的西点军校（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West Point）和澳大利亚的国防学院（Australian Defense Force Academy，ADFA）承担了成员国学员的交流培训职能，这些学员在培养军事协调能力的同时，还深入了解所在国文化和价值观，[①]将社会文化转变为共识。在军事合作方面，自1992年首次举行美印双边演习以来，马拉巴尔演习（Exercise Malabar）已逐步扩展为美、日、印、澳四方军事合作平台。2020年，澳大利亚重返该演习，标志着四国地区协同作战能力日益增强。这些演习不仅提高了成员国之间战术协调能力，还促进了信息共享和战术适应，提升了四国的战略协作能力。[②]在AUKUS框架内，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也开展了多次联合军事演习、技术转移转化，增强了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威慑力。尤其是澳大利亚通过与美国和英国的防务合作，获得了核潜艇技术，在维护地区利益和增强集体海上威慑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③]随着场域内形成的制度性依赖不断加深，美国不断重塑和再生产权力关系，使得盟友间在面对复杂和多变的地缘环境时能够更加

① Carol V. Evans, “Providing Stability and Deterrence: The US Army in INDOPACOM,” *The US Army War College Quarterly: Parameters*, Vol.51, No.1, 2021, pp.35–36.

② David Brewster, *India and China at Sea: Competition for Naval Dominance in the Indian Ocean*, p.137.

③ Derek McDougall, “AUKUS: a Commonwealth Perspective,” p.572.

灵活和高效地应对。

另一方面，共有认同是社会场域的结果。经过社会化的过程，Quad和AUKUS的成员国都形成了一套共有知识框架，在规范性、社会性层面上也趋同于美国，这些共有认同不仅为联盟体系提供了政治基础，也增强了成员国的内聚力。例如，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共同抵制所谓“威权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①]这种带有鲜明纽带特征的国际体系叙事强调了对过去的提及，描绘全球结构和各国的身份、价值观、目标，并非简单的使各国保持战略对齐，也非通过制度化的手段约束各主体行为，而是塑造主体间的内生性规范。同时美国还试图建立集体记忆，通过纽带叙事来追忆各成员国的行为性（互动的范围和深度）、情境性（属于共同的历史与文化）和规范性（相互承诺、共同的价值观），进一步赋予社会成员身份。[②]例如，美国通过对英美澳三国的情景再现强调了其在文化和历史上的密切联系，并加之在防务安全、军事协作的深度与广度，描绘了属于三方共同的集体记忆；通过强调与日印两国间的相互承诺与共同价值观描绘了属于该集体共有的未来愿景。美国通过集体过去与未来的纽带叙事塑造了文化认同，建构了集体记忆，使其成为共有认同的核心载体。如前文所言，在“叙事权力—社会化”的过程中，美国与盟友间构建了深层次的共有认同，这种认同不仅仅是简单的战略利益契合，更是基于主体性、规范和规则所形成的情感纽带。同时，场域内部的符号互动进一步推动制度性规范转向内生性规范，使现有的联盟体系逐渐向“网络化结构”转型，进一步增强了体系的内聚力和执行效能。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2017, pp.45–47; 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How America Can Shore up Asian Order A Strategy for Restoring Balance and Legitimacy,” pp.2–3.

② Tracy Adams, et al., “How Do States Reminisce? Building Relations Through-Bonding Narratives,” pp.47–65.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建构叙事框架，为解构美国“印太”联盟体系网络化的尝试构筑新理解视角。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侧重于物质利益和权力分配，而本文提出的“权力—知识”机制、社会场域、共有认同的作用在这些理论框架较少受到关注。通过创造知识、沟通行动和建立共有认同，美国使盟友间形成了社会层面纵向耦合与政府间层面横向耦合的网络化体系。美国在推进“印太”战略实践中的这些做法值得中国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外交实践中予以关注。

首先，通过共同体叙事塑造共鸣。美国的话语叙事操控主要基于“安全化”知识建构与“我者—他者”的身份赋予，中国更要在国际体系叙事层面上解构美国的话语叙事，在战略叙事的维度上从历史、实践、未来、价值、文化等层面出发，通过情境、规范的叙事使当前国际社会内部的“他者”与“被规制者”在更广范围的共同体叙事框架下找到利益与责任的交汇点。[①]事实而言，中国在目前共同体叙事框架下所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已经在国际社会层面获得了广泛认同，[②]这种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叙事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主要国际组织的价值共鸣，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美国叙事的负面影响。

其次，寻求集体层面的身份认同。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在集体层面尚未形成主导身份认同、社会认同时，社会群体往往会采取单一或混合的认识论策

① 赵可金、孟晴：《新时代的大国心态及其建设》，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139—144页。

② 截至2024年11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连续八年写入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irst Committee）决议。参见《联大一委呼吁在外空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24年11月7日，第3版。

略来寻求声望地位，以实现或突显身份的特殊性。[①]参照国际政治社会学理论，中国可以在“亚太—印太”地区层面塑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社会共识的多元认识论，以此来实现身份认同。不同于西方一元主义的思维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了多元主义的视野，将人、自然与社会相统一，从整体的角度超越“自我”本体的假定。[②]这有助于在建构社会认同过程中塑造“个体—伙伴—共同体”的多元认识论，使社会内部充分认识到个体与结构的关系并非是以某个个体为中心的单向施动，而是关系网络的互动，以此来构筑跨行为主体的关系场域，在社会场域内部获得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最后，通过场域实践建构关系认同。“行胜于言”，不同于美国通过话语操控改变地缘安全环境，创造社会需求所构建的安全合作场域，中国提出的共同体叙事更多是一种关系性合作场域，可通过场域内主体间互动过程来建构互信、合作、共赢的关系认同。就目前而言，中国在“亚太—印太”场域的关系性互动中已取得不少成效。例如，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中国与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③]中国已与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3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当地创造了超过33万个就业岗位。[④]这种良性的关系性互动为中国在社会场域内部建立关系认同奠定了良好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霸权的影响力在国际体系内的广度、深度超出了对于权力和制度的一般性认识，本文实证研究所论述的文化塑造能力正是其权威的重要体现。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关于美国外交实践的政策研究已形成较为

① Henri Tajfel,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Henri Tajfel e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pp.27–98.

② 高飞、于泽洋：《全球治理困境与中国治理方案》，载《当代中国与世界》，2024年第4期，第68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载《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1日，第11版。

④ 殷德生、金培振、吴虹仪：《共建“一带一路”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证据》，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144—146页。

丰富的文献积累，更应在诸多学者提供的现象性描述中发现内在规律，探究逻辑机制，从学理层面将美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解构与重构。这不仅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还能为理解美国权力关系的内涵以及权力行使的底层逻辑提供更为全面的解读工具。

收稿时间：2024年10月
（责任编辑：耿　召）

Network Building of U.S. Indo-Pacific Alli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Power

Yu Zeyang Gao Fei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reat power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United States is reshaping its system of allies and partners to construct a value-based Indo-Pacific alliance network. Through discourse manipulation, the U.S. constructs specific narrative frameworks, transforming its security and interest requirements into shared knowledge. Under the power-knowledge mechanism, the U.S. establishes narrative power within the alliance system, enhancing internal cohesion and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While traditional alliance theories emphasize material interests and power distribu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factors such as discourse manipulation, narrative power, and shared identity receiv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within thes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U.S. Indo-Pacific alliance system's network-building pathway comprises three specific steps: first, the U.S. creates "securitized" knowledge through discourse manipulation, forming narrative power; second, it initiates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through communicative actions, establishing social norms and defining social rules; finally,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 forms field relations, where allies develop shared cognition, establish shared identities, and build shared culture through relational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field, promoting the alliance organization's systematic and networked development. Through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Quad and AUKUS, thes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re verified, demonstrating how the U.S. has constructed a networked system featuring vertical coupling at the social level and horizontal coupling at the intergovernmental level among allies.

Keywords: Indo-Pacific Alliance System; Narrative Power; Discourse Manipulation; U.S. Foreign Policy